
进口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偏高之谜

魏浩 涂悦*

内容提要 企业出口市场的稳定与拓展是国家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2000-2016年中国企业进出口数据,本文考察了企业从特定市场的进口经历对企业从该市场出口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一般认知不同,中国企业从特定市场的进口经历显著提高了企业从该市场出口退出的概率。其原因是,企业的进口经历会降低出口沉没成本,导致企业的出口滞后性减弱和出口试错效应增强,进而提高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与此同时,企业的进口经历也会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和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降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但是,提高效应大于降低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初期以及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小型出口企业的提高效应较大,当企业具有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时,提高效应会减小。本文研究为解释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国家和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提供了政策指导。

关键词 进口市场经历 出口市场退出 信息壁垒 沉没成本 进出口市场重叠

一 引言

企业出口市场的稳定与拓展,对推动外贸稳定发展和激发出口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 魏浩(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家进口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100875 电子信箱:weihao9989@163.com;涂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信箱:tuyue711@163.com。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扩大进口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对策研究”(23ZDA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义,是国家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注重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十四五”规划指出,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要注重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引导企业深耕传统出口市场、拓展新兴市场。2023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引导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可见,国家高度重视出口企业的“保市场”和“拓市场”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现实中,中国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现象十分普遍。Kasahara and Tang (2019)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进入某出口市场1年后便退出该出口市场的比例平均高达60%。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例,国外文献中也已被广泛揭示(Eaton *et al.*, 2007; Albornoz *et al.*, 2012; Blum *et al.*, 2013; Bernini *et al.*, 2016; Lawless *et al.*, 2019)。贸易经验通常被认为是促进企业出口存活、降低其出口退出概率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口经验的作用,认为企业的过往在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有利于企业了解出口市场需求,降低出口不确定性,进而减少企业出口退出风险(Albornoz *et al.*, 2016; Esteve-Pérez, 2021)。那么,一个同样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是,进口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是否具有类似影响?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为考察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影响,本文先使用中国海关数据对进口市场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统计。根据企业在向特定市场出口前是否具备从该市场进口的经历,我们将出口企业分为有无进口市场经历两类,并分别统计了它们的出口市场退出率,即退出该出口市场的企业数量占该出口市场同类企业总数量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出口市场退出主要指企业在单个市场的中断型出口退出,即当年出口下一年不出口(Paravisini *et al.*, 2015; Fitzgerald and Haller, 2018),旨在揭示企业在单个市场的出口连续性和出口动态调整情况^①。图1-4分别展示了2003-2015年^②有无进口经历的出口企业在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的出口市场退出率情况^③。

① 与此相对应,持续型出口退出行为是指企业从某一年停止出口之后,一直到样本期结束,都不再进入出口市场(Iacovone *et al.*, 2013),主要反映企业出口市场的存活状态。

② 本文实际用到的样本年份是2000-2016年,为确定企业是否具有进口经历和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情况,即避免左删失和右删失问题,选取了2003-2015年进行考察。具体解释参见本文变量说明部分。

③ 限于篇幅,未报告中国企业在英国、荷兰、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其他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退出情况,有需要可到本刊网站(www.jweonline.cn)下载本文附件。

进口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偏高之谜

直觉上,有同一市场进口经历能让企业更直接地接触到当地市场,更熟悉当地市场情况,有利于减少信息壁垒,从而减少企业出口退出的风险。然而,从图1-4可知,在大多数国家和年份,具有从特定国家进口经历的出口企业反而比不具有从该国进口经历的出口企业具有更高出口市场退出率,且这种现象在样本初期更加明显。这一特征事实与我们通常认为进口经验会降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率的预期相反,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进口市场经历与企业退出该出口市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揭示其中的内在理论机制,以便弄清上述特征事实背后的原因,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行为的理解,拓宽对企业进口影响出口渠道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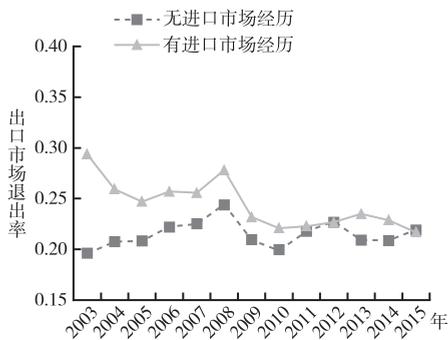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出口市场退出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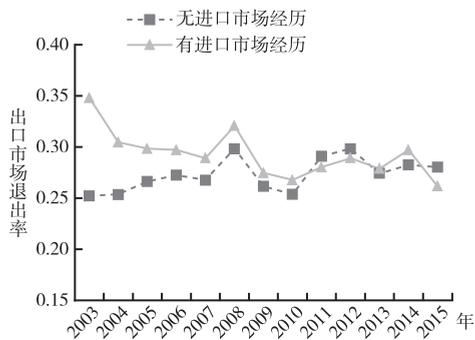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出口市场退出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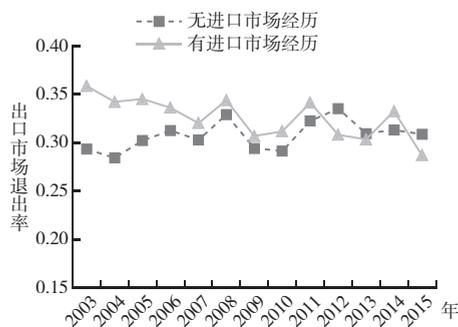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企业在法国的出口市场退出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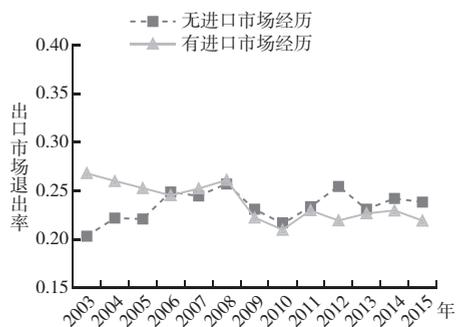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企业在日本的出口市场退出率

事实上,从进口经历视角探究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决策,不仅是对已有文献在研究内容和理论机制上的拓展与完善,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进口经历本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降低

进口关税,推动进口贸易迅速发展,有进口经历的企业也日益增多。在2000-2016年,开展过进口贸易的中国企业数量累计达53.3万家^①,而在出口前就有进口经历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28.9%^②,表明有大量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是从进口贸易开始的。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指出,在新时期,主动扩大进口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③。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国家宏观战略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可能开展进口贸易,进而对企业的后续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第二,同时考虑企业的进口和出口行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进口和出口是实现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有效联通的两条重要渠道,是连接国内和国际循环的两条关键纽带。推动进出口协同发展是中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考察进口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影响,厘清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利于国家政府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推动进出口协同发展的途径,帮助企业利用进口经历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和优化出口市场布局,从而更好地实现扩大进口和促进出口的双重战略目标,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此,在已有文献和以上特征事实基础上,本文系统分析了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3种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2000-2016年的海关进出口数据,检验了特定市场的进口经历对企业从该特定市场出口退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一般认知不同,本文研究发现,特定市场的进口经历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这种提高效率主要是由于企业出口前的进口市场经历降低了出口沉没成本,导致企业的出口滞后性减弱和出口试错效应增强,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特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实际上是企业灵活调整出口市场和大胆开拓新出口市场的结果。与此同时,特定市场的进口经历还会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和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降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只是降低效应在总效应中未占据主导地位。

本研究主要对以下3支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第一,关于进口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研究进口通过产品渠道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这类研究普遍认为,企业的进口尤其是中间品进口,会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投入品质量、丰富投入品种类和投入品技术溢出等机制,提高企业生产率或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① 作者根据2000-201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测算。

② 作者根据2000-201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测算。

③ 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18-11/05/content_5337572.htm。

从而促进企业出口(Bas, 2012; 张杰等, 2014; Feng *et al.*, 2016; 许家云等, 2017; 魏浩和张文倩, 2022)。但是, 企业的成功出口不仅取决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还取决于企业对出口市场的了解(Eriksson *et al.*, 1997)。Pinho and Martins(2010)基于葡萄牙中小型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缺乏潜在出口市场知识是企业出口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Artopoulos *et al.*(2013)指出, 相对产品知识和生产知识, 市场知识是企业持续出口到发达国家的约束。可见, 市场知识对企业出口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目前从市场视角探究进口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本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

第二, 关于企业出口动态的研究。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都需要支付大额沉没成本, 使得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后不会轻易退出, 而是选择保持相对稳定的出口状态(Roberts and Tybout, 1997)。然而, 大量经验研究却表明, 企业在特定出口市场的退出行为十分普遍和频繁(Lawless *et al.*, 2019; Kasahara and Tang, 2019; 魏浩和涂悦, 2023)。对于企业频繁的出口市场退出, 已有研究主要从出口不确定性(Nguyen, 2012)、出口试水策略(Albornoz *et al.*, 2012)、市场核心程度(Gullstrand and Persson, 2015)、偶然出口(Geishecker *et al.*, 2019)和贸易中介(铁瑛和刘逸群, 2021)等角度进行了解释, 本文则从企业进口市场经历能降低沉没成本的反向视角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给出了一个新解释, 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

第三, 关于贸易经验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贸易经验包括出口经验和进口经验。关于出口经验的研究相对丰富, 一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出口网络或出口经历获得出口经验, 降低信息壁垒, 促进企业后续出口(Defever *et al.*, 2015; Morales *et al.*, 2019; 吴群锋和杨汝岱, 2019); 另一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邻伴网络、产业集聚及城市空间毗邻等外部效应学习出口经验, 进而对其出口行为产生影响(张国峰等, 2016; 蒋灵多等, 2018; 赵永亮和刘猛, 2020)。而关于进口经验对出口影响的研究较少, 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企业自身进口经历对出口的影响, 认为进口市场经历有利于减少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不确定性, 帮助企业建立贸易网络, 降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 从而推动企业的出口市场进入(Erbahar, 2019; 王永进和孟珊珊, 2022), 减少出口市场退出(Stirbat *et al.*, 2015; Meinen, 2015)。与这些研究不同, Choquette(2019)对丹麦的研究发现, 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会通过减少出口沉没成本, 增加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 然而, 该研究忽略了进出口市场的同期重叠机制, 将出口企业是否同时从特定市场进口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 在方法上可能存在“坏控制变量”的问题(Angrist and Pischke, 2009)。可见, 已有少数文献关于进口市场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在机制分析上也不够全面,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发现了在特定市场具有进口经历的中国企业从该市场出口退出概率偏高的特征事实,并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除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外,本文还从沉没成本降低的视角,分析了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并提出了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引致的风险对冲效应和风险叠加效应,拓展了已有研究中关于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渠道。(2)已有文献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从进口市场经历视角对企业频繁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提供了一个新解释。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出口失败,可能是由于出口沉没成本降低使得企业灵活调整出口市场或者积极进行出口试错的结果,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出口市场退出行为。(3)在当前外需走弱、订单下降背景下,出口市场的稳定与拓展成为中国外贸工作的重要任务,本研究为出口企业如何审时度势、利用进口市场经历以便更好地拓展出口市场、规避外部市场风险和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政策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经验研究模型、变量与数据;第四部分是经验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拓展性分析;最后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理论分析

本文探讨的“进口市场经历”和“出口市场退出”均是基于企业-市场层面,具体来说,进口市场经历是指企业在首次出口到某个特定市场之前,从该市场进口的经历;出口市场退出是指当年向某个特定市场出口的企业,下一年不再向该市场出口。下面本文分别对企业进口市场经历影响出口市场退出的机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

(一)信息壁垒降低机制

进口市场经历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减少了企业向特定市场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成功率,降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具体来看:一方面,进口市场经历有助于企业获取当地市场知识,降低信息壁垒。企业从特定市场进口的经历,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到当地制度、文化、法律法规要求和企业经营习惯,熟悉当地企业外贸模式和商务模式,掌握当地商品的生产标准,开拓国际化视野,使得企业在安排出口商品生产和销售时,可以减少信息摩擦,降低出口不确定性,有利于降低企业从该市场出口退出的概率(Meinen, 2015; Erbahar, 2019)。

另一方面,进口市场经历有助于企业建立贸易网络,降低信息壁垒。企业从特定市场进口后,与外国供应商建立起了联系,而外国供应商可能会给本国出口企业介绍当地进口客户,帮助企业建立出口网络^①,有效克服企业在搜寻客户时面临的信息壁垒,降低搜寻成本,进而降低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吴群峰和杨汝岱,2019)。Kneller and Pisu(2011)基于英国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出口最大的障碍是与目的地市场首次建立联系,企业自身去外国市场搜寻客户是十分困难的,而通过外国供应商在当地寻找到客户则相对容易。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假说1。

假说1: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会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降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

(二)沉没成本降低机制

进口市场经历会通过沉没成本分担渠道,降低企业出口到该市场的沉没成本。由于进口和出口的沉没成本都包括收集国外市场信息、调研国外监管环境以及了解税收和贸易信贷规则过程中支付的成本,二者存在交叉,具有互补性(Kasahara and Lapham, 2013; Meinen, 2015)。因此,具有特定市场进口经历的企业在支付进口沉没成本后,后续再出口到该市场时,支付的出口沉没成本就会降低,这就产生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和出口试错效应,两种效应均会增加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

第一,逆向出口滞后效应。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沉没成本(Roberts and Tybout, 1997),因此,企业在出口市场遭受负向冲击时,即使暂时遭受亏损,也可能不会选择立即退出,而会选择坚守市场,即出口退出行为具有滞后性。与此相反,当企业出口沉没成本降低时,就会产生逆向的出口滞后效应,即出口滞后性减弱。此时,企业一旦在出口市场遭遇负向冲击,例如,负向需求冲击、汇率升值、不确定性上升及政治经济风险增加等,企业便更倾向于立即退出该市场止损,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增加(Albornoz *et al.*, 2016)。

第二,出口试错效应。由于进入新出口市场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通常会先选择一个出口目的地进行小规模开拓,如果成功,则继续向该目的地市场出口,并拓展至周边相邻市场,否则会退出该市场(Eaton *et al.*, 2007; Albornoz *et al.*, 2012; Blum *et al.*, 2013)。当出口沉没成本较高时,出口试错成本也较高,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进入

^① 外国供应商有很强的动机给本国出口企业介绍当地客户,这是因为通过给出口企业介绍当地客户,可以促进出口企业销售,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增加出口企业的进口需求,进而也有利于外国供应商自身的销售(Erbarhar, 2019)。

新出口市场,此时企业的出口行为相对谨慎,通常是企业决策者深思熟虑、充分准备后的战略性决定,出口成功可能性较高,出口市场退出的概率较低。而当出口沉没成本降低时,企业的出口试错成本也降低,企业可能会更加积极地、频繁地通过小规模出口在一些进入门槛较低的出口市场进行试水,一旦失败,便选择退出该出口市场。此时,企业的出口行为可能具有更强的试错性和机会主义特征,而不是战略性行为(Besedeš and Prusa, 2011; Albornoz *et al.*, 2016),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增加。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假说2。

假说2: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会通过沉没成本降低机制,产生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和出口试错效应,增加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

(三)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

在向特定市场出口前,企业从该市场进口的经历,能通过路径依赖提高企业后续从该市场进口的概率,还能通过降低出口不确定性和降低出口沉没成本,提高企业后续向该市场出口的概率(Meinen, 2015)。也就是说,如果出口企业在向特定市场出口前就具有从该市场进口的经历,企业后续发生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的概率也相应提高。

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会对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产生两种方向相反的调节效应。第一,汇率风险对冲效应。当本币升值时,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增加,但如果企业的进出口市场重叠,本币升值有利于降低企业进口成本,缓解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从而产生风险对冲效应,降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第二,非汇率风险的叠加效应。当某国外市场的经济政治风险等非汇率风险升高时,由于企业在该市场同时进口和出口,来自生产端(进口)和销售端(出口)的风险将同时增加,产生风险叠加效应,从而增加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假说3。

假说3: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会通过进出口市场重叠机制产生风险对冲效应,降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也会通过进出口市场重叠机制产生风险叠加效应,增加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

三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本文参考 Paravisini *et al.*

(2015)和Albornoz *et al.* (2016)的做法,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Exit_{jt} = \alpha + \beta \times Impbefore_{jt} + \varphi_t + \gamma_f + \eta_j + \mu_{ft} + \delta_{jt} + \varepsilon_{jt} \quad (1)$$

其中,下标 f 、 j 、 t 分别表示企业、出口市场(或进口市场)和年份, $Exit$ 表示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 $Impbefore$ 反映企业是否具有特定市场进口经历。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不同层次的固定效应,包括年份、企业、目的地、企业-年份以及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分别用 φ_t 、 γ_f 、 η_j 、 μ_{ft} 及 δ_{jt} 表示,以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偏误。 ε_{jt} 表示残差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Exit_{jt}$ 是本文被解释变量,反映企业的特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如果企业 f 在第 t 年向 j 国出口,而第 $t+1$ 年不向 j 国出口,则 $Exit_{jt}=1$,否则为0。由于本文样本数据区间为2000–2016年,无法判定企业在2016年之后是否继续出口,存在右删失问题,因此,本文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的界定截止到2015年。

2. 核心解释变量。 $Impbefore_{jt}$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反映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我们参考Stirbat *et al.* (2015)、Choquette (2019)的做法,对进口市场经历做出如下界定:如果企业 f 在第一次出口到 j 国市场之前,曾从该市场进口,则 $Impbefore_{jt}=1$,否则为0。由于本文样本数据区间为2000–2016年,无法确定企业在2000年之前是否出口到这个目的地,存在左删失问题。本文将企业初始出口年份限定在2003年及之后,这样,即使企业在2000年之前有出口,但是间隔3年之后重新出口,对重新进入出口市场已经没有显著影响,可以视为首次出口。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自2000–201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每笔进出口交易的金额、交易数量、出口目的地或进口来源地、贸易模式、运输方式等信息。我们先将海关出口数据整合到企业-国家-年份层面;然后根据海关进口数据统计出企业首次从某市场进口的年份,并将进口数据整理到企业-国家层面,再与海关出口数据匹配,判定企业是否具有进口市场经历,进而得到本文基准回归部分所用的数据集。

四 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汇报了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从该出口市场退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4)列分别加入了固定效应的不同组合。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 $Impbefore$ 的系

数在各列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十分相近,结果十分稳健。这一结果表明,具备进口市场经历会显著提高企业退出该出口市场的概率,与前文特征事实呈现的主要结果相符。具体来看,根据表1第(4)列的结果,与不具有从特定市场进口经历的出口企业相比,有特定市场进口经历的出口企业,退出该出口市场的概率会高2.6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与一般认为的进口经历会降低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观点不同,根据我们的理论机制分析,这可能是由于进口市场经历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沉没成本,导致企业的出口滞后性减弱和出口试错效应增强,也可能是由于进口市场经历使得企业更容易出现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产生进出口风险叠加效应,导致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提高,具体是由哪种效应引起,后文做进一步探讨。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i>Exit</i>			
<i>Impbefore</i>	0.022*** (0.001)	0.024*** (0.001)	0.023*** (0.001)	0.026*** (0.001)
常数项	0.559*** (0.000)	0.559*** (0.000)	0.561*** (0.000)	0.561*** (0.0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目的地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286 741	13 286 720	12 673 286	12 673 265
调整后的R ²	0.209	0.214	0.319	0.323

说明: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及***分别表示10%、5%及1%的显著性水平。后表同。

(二)内生性处理

在本研究中,由于出口市场退出必然发生在进口市场经历之后,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较弱,主要可能存在由遗漏变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下面我们对这两种内生性问题依次进行讨论和处理。

1. 遗漏变量偏误。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与出口市场退出可能同时受某些因素影响,为缓解由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样本初期(2000年)企业所在城市从

进口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偏高之谜

特定目的地进口的企业数量的对数值(*Peer*)构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考虑到如果企业自身在2000年也从该市场进口,可能会通过信息溢出效应影响同一城市当年从该市场进口的企业数量,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剔除了2000年从该市场进口的样本。在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方面,由于信息溢出效应的存在,企业是否选择从某一市场进口很可能会受到同一城市其他进口企业的影响(Hu and Tan, 2020),如果样本初期同一城市从该市场进口的企业数量较多,那么,企业选择从该市场进口的概率可能也较大,企业在向该市场出口前具有该市场进口经历的概率也较大,满足相关性假定。

在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方面,由于企业间信息溢出效应的存在,同一城市内具备从同一市场进口经历的企业数量越多,企业向该市场出口时面临的信息壁垒和沉没成本也可能越低,因而工具变量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而不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对此,本文首先使用出口市场退出变量(*Exit*)对工具变量(*Peer*)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第(1)列。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的确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接着,为检验工具变量是否直接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本文参考Acemoglu *et al.* (2001)与铁瑛等(2019)的方法,将工具变量(*Peer*)纳入基准回归方程,表2第(2)列汇报了相应回归结果。可以

表2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结果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		第一阶段结果	第二阶段结果
	(1)	(2)	(3)	(4)
	<i>Exit</i>	<i>Exit</i>	<i>Impbefore</i>	<i>Exit</i>
<i>Peer</i>	0.001*** (0.000)	0.001 (0.001)	0.012*** (0.000)	
<i>Impbefore</i>		0.027*** (0.001)		0.078*** (0.024)
常数项	0.560*** (0.001)	0.560*** (0.003)	0.005*** (0.000)	0.560*** (0.001)
观测值	12 643 520	12 643 520	12 643 520	12 643 520
调整后的R ²	0.298	0.323	0.242	0.298
Kleibergen-Paap rk LM			5281.136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56123.2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5770.97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看到,工具变量的系数变小且不再显著,这说明工具变量并不直接对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验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表2第(3)和(4)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根据第(3)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LM统计量拒绝了不可识别假设,Cragg-Donald-Wald F统计量和Kleibergen-Paap Wald F统计量均远大于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4)列中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变量 *Impbefore* 的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样本选择偏差。基准回归中的样本是所有开展过出口贸易的企业,然而,一些具有进口市场经历的企业可能并没有出口,即纯进口企业(魏浩等,2022),也就无法观测其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使得研究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在文献中,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解决样本选择偏差的主要方法,但是,由于本文的回归使用了一系列高维固定效应,无法使用Heckman一阶段的probit或logit进行估计(Lee *et al.*, 2023),因此,Heckman两阶段法不适用于本研究。为此,我们借鉴Fitzgerald and Haller(2018)与Berman *et al.*(2019)运用无穷处识别(identification-at-infinity)的方法处理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该方法主要通过限制回归样本实现,其基本思路是,估计全体样本达到行为门槛值的概率,预期以最高概率达到行为门槛值的样本发生样本选择偏差的概率最小,因而对这类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最接近真实值。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不同,无穷处识别的方法不需要假定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假定,也不需要排除性约束,但需要依赖大样本进行识别,这正好与本文的研究背景相符。

遵循无穷处识别的方法,本文先基于全体样本估计企业在整个样本期的出口市场进入方程,以企业在样本期是否向某目的地出口作为因变量,加入企业所在地区、企业所有制以及出口目的地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然后,根据估计结果计算出各观测值的出口市场进入概率,分别以出口市场进入概率在25%、50%及75%分位数以上的观测值为子样本,重新估计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第(1)-(3)列,结果表明,*Impbefore*在各列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特别地,表3第(3)列是基于出口市场进入概率在75%分位数以上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该列结果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可能性相对最小。综上,该列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十分接近,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受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较小,具有稳健性。

表 3 样本选择偏差检验结果

子样本	(1)	(2)	(3)
	25%分位数以上	50%分位数以上	75%分位数以上
	<i>Exit</i>		
<i>Impbefore</i>	0.020*** (0.002)	0.018*** (0.003)	0.018*** (0.005)
常数项	0.566*** (0.000)	0.589*** (0.000)	0.622*** (0.000)
观测值	9012 952	6422 528	3603 332
调整后的 R ²	0.291	0.287	0.268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取改变指标衡量方式、改变样本、排除其他渠道影响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均十分稳健^①。

第一,改变指标衡量方式。(1)改变进口市场经历的衡量方式。参考 Meinen (2015)的方法,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衡量进口市场经历,一是首次向特定市场出口前,从该市场进口的历年平均金额;二是首次向特定市场出口前,最近一次从该市场进口的金额。(2)改变出口市场退出的界定方式。一是参考 Eaton *et al.* (2007)采用的3年期界定方法:如果企业 f 在第 $t-1$ 和第 t 年都向 j 国出口,但第 $t+1$ 年不向 j 国出口,则 $Exit_{jt}=1$,否则为0。二是参考 Iacovone *et al.* (2013)采用的基于整个样本期的界定方法:如果企业 f 在第 t 年向 j 国的出口额为正,之后各年都不再向 j 国出口,则 $Exit_{jt}=1$,否则为0。

第二,改变回归样本。(1)不考虑左删失问题。为减少样本损失,本文不考虑左删失问题,将2000-2002年的样本也纳入回归。(2)剔除同年首次进出口的样本。由于无法对同一年首次向 j 国进口和出口的样本准确界定进口市场经历变量的取值,本文将这部分样本剔除后重新回归。(3)剔除贸易中间商。贸易中间商是纯粹从事进出口贸易代理的中介企业,其出口行为可能与生产型企业不同,为避免这部分样本的干扰,本文参考 Ahn *et al.* (2011)的做法,剔除企业名称中含有“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和“外经”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4)剔除加工贸易样本。出口贸易方式不同可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汇报,有需要可到本刊网站(www.jweonline.cn)下载本文附件。

能会使进口经历对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本文剔除了加工贸易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第三,排除其他渠道影响。(1)排除偶然出口行为的影响。企业的出口参与行为可能是出于一些特殊的偶然因素,不具有普遍性规律。为排除偶然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将样本限定在至少持续出口3年的企业重新回归。(2)排除出口间断的影响。企业在首次连续出口中断后,重新进入该市场的沉没成本可能发生变化,为避免这种可能的干扰,本文只考虑进口经历对企业在这个市场第一个出口持续期的影响,重新进行回归。(3)排除生产率渠道的影响。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可能同时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和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因此,本文进一步排除生产率渠道的影响。由于海关数据无法直接计算企业的生产率,我们采用企业的整体出口参与状态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变量。在回归中加入 *Expbefore* 变量,反映企业在从该市场进口前是否有出口参与的经历,若是,则 *Expbefore*=1,否则为0。

(四)影响机制的检验

1. 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对于信息壁垒降低机制,较难直接进行检验,但由于不同类别的产品在出口时受信息壁垒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我们可以据此进行间接验证。具体来看,同质化产品的出口受信息壁垒的影响较小,即使进口市场经历会降低信息壁垒,也并不会对其出口产生较大促进作用,因而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可能较弱;而差异化产品的信息搜索障碍较大,如果信息壁垒降低,可能会对其出口产生较大促进作用(Rauch, 1999; 吴群锋和杨汝岱, 2019)。因此,如果进口市场经历可以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提高企业成功出口的概率,减少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那么,这种影响对同质化产品的影响较小,对差异化产品的影响较大。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根据 Rauch(1999)分类法,将产品分为同质产品和差异化产品。由于样本中大量企业是多产品企业,在同一个市场既可能出口同质化产品,又可能出口差异化产品,难以准确判断企业出口产品的所属类别。本文借鉴 Amiti *et al.* (2014)的思路,采用两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只保留样本中在特定市场只出口一个类别产品的企业;二是根据企业在特定市场出口份额超过50%产品的所属类别进行判断。据此,本文在回归中加入反映差异化产品的虚拟变量 *Difference* (若是差异化产品, *Difference* 为1,否则为0)及其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4第(1)和(2)列。从中可知,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由于信息壁垒降低机制理论上对出口市场退出会产生负向影响,因此,这一结果说明,差异化产品比同质化产品受到信息壁垒降低机制的影响更大,与预期相符,验证了信息壁垒降低机制。

表 4 信息壁垒降低机制检验

	(1)	(2)
	<i>Exit</i>	
<i>Impbefore</i>	0.019*** (0.001)	0.020*** (0.001)
<i>Impbefore</i> × <i>Difference</i>	-0.012*** (0.002)	-0.005** (0.002)
<i>Difference</i>	0.009*** (0.001)	0.001 (0.018)
常数项	0.570*** (0.000)	0.566*** (0.006)
观测值	9516 742	9097 053
调整后的 R ²	0.249	0.250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2. 沉没成本降低机制。根据前文对沉没成本降低机制的分析,进口市场经历会降低企业的出口沉没成本,进而产生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和出口试错效应,增加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下面本文分别检验这两种效应是否存在。

(1)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如果逆向出口滞后效应成立,那么,在遭受出口市场负向冲击时,具有进口市场经历的企业由于出口沉没成本更低,更可能退出出口市场。为此,本文在回归中加入反映出口市场负向冲击的指标 *Negashock* 及其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检验交互项系数是否显著为正。对于负向冲击(*Negashock*)的衡量,本文主要选用了4组变量:负向需求冲击、汇率冲击、不确定性及风险程度。

第一,对于负向需求冲击,一方面,本文参考 Mayer *et al.* (2021)的做法,用各国进口额(剔除从中国进口的金额)“中点增长率”^①的相反数进行衡量。另一方面,本文采用负向需求冲击的虚拟变量进行衡量,即当进口额增长率为负时,*NegaShock*=1,否则为0。各国历年进口额数据来自 CEPII BACI 数据库。

第二,对于汇率冲击,本文参照盛丹和刘竹青(2017)的做法,采用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衡量。汇率数据和 CPI 数据均来自 IMF 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库。

第三,对于不确定性指标,本文参考魏浩和王超男(2023)的方法,分别选用经济

① 中点增长率值域为[-2,2],具有有界性和对称性的优点。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①和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②衡量。其中,EPU是Baker *et al.* (2016)基于各国主流报刊构建的、旨在反映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涵盖了美国、日本在内的22个国家(或地区)(Baker *et al.*, 2016)。WUI是由Ahir *et al.* (2022)基于每季度“经济学人智库国家报告”构建的、旨在反映一国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指数,涵盖了全球143个国家(或地区)。

第四,对于风险指标,本文选用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数据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总风险指标。各原始指标的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数值越低,表示风险程度越高。为便于分析,本文用100减去原始指标衡量负向冲击程度,新指标数值越高,表示风险程度越高。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从中可知,各列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遭受负向冲击时,无论是需求冲击、不确定性冲击,还是风险冲击,具有进口市场经历的企业比不具备的企业都更倾向于退出出口市场,验证了存在逆向出口滞后效应。

表5 沉没成本降低机制检验—逆向出口滞后效应

	(1)	(2)	(3)	(4)	(5)	(6)	(7)	(8)
<i>Negashock</i>	负向需求冲击程度	是否遭受负向需求冲击	汇率冲击	不确定性-EPU	不确定性-WUI	经济风险	政治风险	总风险
	<i>Exit</i>							
<i>Impbefore</i>	0.025*** (0.001)	0.021*** (0.001)	0.013*** (0.003)	0.012*** (0.004)	0.016*** (0.002)	-0.063*** (0.014)	0.020*** (0.003)	0.048*** (0.004)
<i>Impbefore</i> × <i>NegaShock</i>	0.017*** (0.004)	0.008*** (0.002)	0.011*** (0.003)	0.014*** (0.003)	0.031*** (0.005)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egaShock</i>	0.018*** (0.001)	0.016*** (0.000)	0.020*** (0.000)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常数项	0.560*** (0.000)	0.556*** (0.000)	0.539*** (0.001)	0.552*** (0.000)	0.433*** (0.001)	0.476*** (0.004)	0.553*** (0.002)	0.590*** (0.001)
观测值	12 504 707	12 673 286	12 673 286	3718 445	11 971 287	11 746 592	11 746 592	11 746 592
调整后的R ²	0.294	0.294	0.294	0.288	0.297	0.296	0.296	0.296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目的地和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2)出口试错效应。对于出口试错效应,本文分别从时间、空间和出口规模3个维度进行验证。

① 数据网址为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all_country_data.html。

② 数据网址为<https://worlduncertaintyindex.com/data/>。

第一,时间维度的出口试错效应,主要考察有进口经历的企业是否在同一个出口目的地更频繁地试错。如果试错效应在出口时间维度成立,那么,有进口经历的企业在这个市场可能会更加频繁地进入和退出,持续出口期会缩短,出口年份次数减少,出口存活时间减少,每个持续出口期的出口年份数减少,偶然出口的可能性增加。

为此,本文分别构建了 *Years*、*Span*、*Freq*、*Rate*、*Sporadic*、*Last* 作为因变量,检验企业在时间维度的出口试错效应。其中,*Years* 是企业在本期内向该目的地出口的总年数的对数值,*Span* 是用企业在该目的地最大的出口年份减去最小的出口年份加 1 取对数。*Freq* 是企业在该目的地出口持续时间段的数量与企业在本期内的总年份数的比值,*Rate* 是企业在该目的地出口持续时间段的数量与企业在本期存续期的比值,*Freq* 和 *Rate* 从不同维度反映了企业在该目的地出口进入退出的频次,两个变量的数值越大,说明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频率越高。*Sporadic* 是企业是否在本期内只向这个目的地出口 1 年,如果是,则为 1;否则为 0。以上 5 个变量的数据层次均为企业-目的地层面。*Last* 是企业每个持续期的年份数,数据层次为企业-目的地-出口持续期层面。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从中可知,具有进口市场经历的企业,其出口年份数和出口存续期更短,出口进入退出的频次更高,出口持续期更短,偶然出口的概率更大。这一系列的结论都表明,进口市场经历使企业在出口市场进入退出的频率增加,出口持续期变短,验证了企业在时间维度上的出口试错效应。

表 6 沉没成本降低机制检验:出口试错效应(时间维度)

	(1)	(2)	(3)	(4)	(5)	(6)
	<i>Years</i>	<i>Span</i>	<i>Freq</i>	<i>Rate</i>	<i>Sporadic</i>	<i>Last</i>
<i>Impbefore</i>	-0.090*** (0.002)	-0.095*** (0.002)	0.045*** (0.001)	0.047*** (0.001)	0.065*** (0.001)	-0.191*** (0.005)
常数项	0.505*** (0.000)	0.579*** (0.000)	0.763*** (0.000)	0.721*** (0.000)	0.541*** (0.000)	1.785*** (0.000)
观测值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7401 137
调整后的 R ²	0.293	0.360	0.284	0.283	0.243	0.177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和目的地固定效应。

第二,空间维度的出口试错效应,主要考察有进口经历的企业是否会选择在一些进入门槛较低的出口目的地市场试错。企业向不同出口目的地市场出口需要支付不同的沉没成本(Bernard *et al.*, 2007; Eaton *et al.*, 2011)。通常,出口目的地等级越高,

该市场的出口门槛值越高,出口沉没成本相对更高。因此,如果企业出口到目的地等级较高的国家,需要支付的沉没成本也较高,试错成本也较高,那么,即使进口市场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沉没成本,也很难让企业达到进入该市场的门槛值,因而企业仍不会轻易进入该市场试错。如果企业出口到目的地等级较低的国家,需要支付的出口沉没成本相对较低,由于进口市场经历降低了出口沉没成本,使企业更可能达到这些市场的出口门槛值,进入这些国家试错。因此,如果沉没成本降低机制带来的出口试错效应在空间维度成立,那么,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在目的地等级较低的国家影响可能更大。

为稳健起见,本文对于出口目的地的等级 *Hierarchy* 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界定。第一,根据历年中国出口企业在各市场的平均数量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将拥有出口企业数量最多的市场等级界定为1,第二多的市场等级界定为2,以此类推。第二,根据各国作为历年中国出口企业首个出口市场的次数从大到小排序,将次数最多的市场等级界定为1,次数第二多的市场等级界定为2,以此类推。此外,由于不同产品的出口目的地等级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还分别按照前两种界定方式,统计每个HS2位码下的出口目的地等级,并根据企业出口金额最大的HS2位码产品进行匹配,分别形成出口目的地等级的第3种和第4种界定。在回归中,加入变量 *Hierarchy* 和 *Impbefore* 的交互项,如果出口试错效应在空间维度成立,则交互项应显著为负,即具有进口市场经历的企业在等级越低的出口目的地试错的可能性越大,市场退出可能性越大。

回归结果见表7。从中可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定义出口目的地等级,各列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进口市场经历通过降低沉没成本对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在出口目的地等级较低的出口目的地影响较大,在市场等级较高的出口目的地影响较小,从而在空间维度验证了出口试错效应。

表7 沉没成本降低机制检验:出口试错效应(空间维度)

	(1)	(2)	(3)	(4)
<i>Hierarchy</i>	第1种	第2种	第3种	第4种
	<i>Exit</i>			
<i>Impbefore</i>	0.031*** (0.001)	0.032*** (0.001)	0.032*** (0.001)	0.028*** (0.001)
<i>Impbefore</i> × <i>Hierarchy</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Hierarchy</i>			0.002*** (0.000)	0.003*** (0.000)

进口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偏高之谜

(续表)

<i>Hierarchy</i>	(1)	(2)	(3)	(4)
	第1种	第2种	第3种	第4种
	<i>Exit</i>			
常数项	0.561*** (0.000)	0.561*** (0.000)	0.561*** (0.000)	0.501*** (0.001)
观测值	12 673 265	12 673 265	12 673 265	12 660 129
调整后的R ²	0.298	0.298	0.298	0.300

说明:所有回归控制了企业-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第三,出口规模维度的试错效应,主要考察有进口经历的企业是否通过小规模出口进行出口市场探索。一方面,如果进口市场经历通过降低沉没成本促进了企业的出口试错,那么企业在初期的出口规模可能较小(Albornoz *et al.*, 2016)。为此,本文分别以企业在进入某出口市场第1年的出口金额对数值(*Vinitial*)和出口数量对数值(*Qinitial*)作为因变量,检验企业在出口规模维度的出口试错效应。回归结果见表8第(1)和(2)列。从中可知,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初始出口规模的影响为负,表示具有进口经历的企业比不具有的企业在进入市场初期的出口规模更小,说明具有进口经历的企业出口更具有试水性质,进而从初期出口规模的维度验证了出口试错效应的存在。

另一方面,从整个样本期看,企业的核心出口市场对企业存活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企业通常会对其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保持相对稳定的出口状态,因此,出口试错更可能发生在企业出口规模较小的非核心市场。为此,我们拟检验相对于核心出口市场,进口市场经历是否会促使企业在出口规模较小的非核心市场更频繁地退出。对于核心出口市场,本文借鉴魏浩和张宇鹏(2020)的做法,采用以下3种方式进行界定:第一,以企业在样本期内向各出口目的地出口的平均金额为标准,金额最大的为核心出口市场;第二,以企业在样本期内向各出口目的地出口的总金额为标准,金额最大的为核心出口市场;第三,以出口目的地在各年成为企业出口金额最大市场的次数进行判定,次数最多的为核心出口市场。当出口市场为核心出口市场时,*Core*=1,否则为0。对于出口退出频次,我们采用前文界定的*Freq*和*Rate*表示。

表8第(3)-(8)列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从中可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界定核心市场,结果均十分稳健。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非核心市场,当企业的出口市场为核心市场时,企业的进口经历反而会进一步

减少企业的出口退出,有利于企业在核心市场维持相对稳定的出口状态。这一结果表明,进口市场经历引致的企业出口试错行为和失败尝试主要发生在企业出口规模较小的非核心市场,这也与预期相符,进而从整个样本期的出口规模维度验证了出口试错效应的存在。

表 8 沉没成本降低机制检验:出口试错效应(出口规模维度)

	(1)	(2)	(3)	(4)	(5)	(6)	(7)	(8)
<i>Core</i>			样本期平均出口 金额最大的市场	Rate	样本期总出口 金额最大的市场	Rate	样本期为核心市场 次数最多的市场	Rate
	<i>Vinitial</i>	<i>Qinitial</i>	<i>Freq</i>		<i>Freq</i>		<i>Freq</i>	
<i>Impbefore</i>	-0.251*** (0.007)	-0.274*** (0.008)	0.044*** (0.001)	0.046*** (0.001)	0.042*** (0.001)	0.045*** (0.001)	0.043*** (0.001)	0.045*** (0.001)
<i>Impbefore</i> × <i>Core</i>			-0.039*** (0.003)	-0.042*** (0.003)	-0.041*** (0.003)	-0.048*** (0.003)	-0.062*** (0.003)	-0.072*** (0.003)
<i>Core</i>			-0.194*** (0.001)	-0.180*** (0.001)	-0.274*** (0.001)	-0.263*** (0.001)	-0.281*** (0.001)	-0.272*** (0.001)
常数项	10.020*** (0.000)	8.291*** (0.000)	0.771*** (0.000)	0.728*** (0.000)	0.773*** (0.000)	0.731*** (0.000)	0.773*** (0.000)	0.731*** (0.000)
观测值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调整后的 R ²	0.247	0.293	0.247	0.293	0.258	0.304	0.259	0.305

说明: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和目的地固定效应。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发现,进口市场经历通过降低沉没成本,产生了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和出口试错效应,二者都增加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事实上,当出口沉没成本较高时,企业不会轻易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而当沉没成本降低后,企业的出口行为受沉没成本的制约减少,使企业做出退出出口市场的决定不再那么艰难,并更愿意在不同市场进行积极的出口尝试。这种出口市场退出是企业灵活进行出口市场调整的表现,也是企业了解出口市场需求的自我探索过程,有利于企业在长期中积累出口经验。因此,这种由出口沉没成本降低引致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出口失败”。

3. 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企业出口前的进口市场经历会提高企业在出口后发生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的概率。而进出口市场的同期重叠,一方面能通过汇率渠道产生风险对冲效应,另一方面能通过非汇率风险渠道,产生风险叠加效应。两种效应可能同时发生,最终效应不确定,需要进行经验

检验。

本文先考察进口市场经历是否会提高企业在出口后发生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的概率。变量 *Both* 表示企业在 *t* 期是否同时从 *j* 国进口和向 *j* 国出口,若是,则 *Both*=1,否则为0。以 *Both*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口市场经历(*Impbefore*)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9第(1)列汇报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Impbefore*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在出口前的进口市场经历会显著提高企业后续出口时发生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的概率。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检验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引致的风险对冲效应和风险叠加效应是否成立。

表9 进出口市场重叠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i>Risk</i>		汇率风险	经济风险	政治风险	总风险	
	<i>Both</i>	<i>Exit</i>	<i>Exit</i>	<i>Exit</i>	<i>Exit</i>	<i>Exit</i>
<i>Impbefore</i>	0.325*** (0.001)	0.052*** (0.001)	0.052*** (0.001)	0.052*** (0.001)	0.052*** (0.001)	0.053*** (0.001)
<i>Both</i>		-0.080*** (0.002)	-0.215*** (0.011)	-0.109*** (0.002)	-0.028*** (0.003)	-0.084*** (0.001)
<i>Both</i> × <i>Exchange</i>		-0.006*** (0.002)				
<i>Exchange</i>		0.020*** (0.001)				
<i>Both</i> × <i>Risk</i>			0.002***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i>Risk</i>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常数项	0.056*** (0.000)	0.543*** (0.001)	0.480*** (0.0038)	0.555*** (0.002)	0.593*** (0.001)	0.564*** (0.000)
目的地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623 029	12 673 286	11 746 592	11 746 592	11 746 592	12 673 265
调整后的 R ²	0.344	0.295	0.297	0.297	0.297	0.299

(1) 风险对冲效应。为检验风险对冲效应,本文在回归中加入汇率变量(*Exchange*)、企业是否同时从该市场进出口(*Both*)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第(2)列。可以看到,*Exchange*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人民币升值时,企业的出口市场

退出概率会显著提高;但 *Exchange* 与 *Both*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人民币升值时,进出口市场重叠会显著抑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降低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验证了风险对冲效应的存在。

(2)风险叠加效应。为检验风险叠加效应,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 *Both* 与目的地风险程度(*Risk*)的交互项,其中,*Risk* 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总风险指标,各指标的衡量方式与前文相同。回归结果见表9第(3)-(5)列。从中可知,*Both* 与 *Risk* 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当风险上升时,进出口市场重叠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验证了风险叠加效应的存在。

以上结论表明,进出口市场重叠机制既会产生风险对冲效应,又会产生风险叠加效应,那哪种效应占主导地位? 进出口市场重叠机制的最终影响又如何? 为此,本文在表9第(6)列中不加入任何交互项,发现 *Both*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进出口市场重叠会减少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风险对冲效应占主导地位。这表明企业在进行进出口市场布局时,可以考虑拓展相同的市场,通过对冲汇率风险,减少出口市场退出。但是,由于风险叠加效应仍然存在,只是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某国的非汇率风险较高时,企业应注意避免对同一市场进口和出口,以减少风险叠加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合以上3种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进口市场经历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而通过沉没成本降低机制则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结合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沉没成本降低在3种机制中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进口市场经历对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主要是由进口市场经历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沉没成本,使得企业的出口滞后性减弱、出口试错性增强导致的。实际上,进口市场经历引致的出口市场退出是企业灵活调整出口市场、积极参与出口试错的结果。通过以上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具有特定市场进口经历的企业比没有的企业呈更高的出口市场退出率,也就解释了有进口市场经历的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率偏高之谜。

(五)异质性分析

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为检验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State*)、外资企业(*Foreign*)与民营企业3类,并以观测值最多的民营企业为基准组,将变量 *State* 和 *Foreign* 各自与变量 *Impbefore* 的交互项分别纳入回归中,表10第(1)列汇报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进口市场经历对民营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最大。

进口经历与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偏高之谜

表 10 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1)	(2)	(3)	(4)	(5)
			<i>Exit</i>		
<i>Impbefore</i>	0.031*** (0.002)	0.049*** (0.004)	0.019*** (0.001)	0.016** (0.008)	0.023*** (0.002)
<i>Impbefore</i> × <i>State</i>	-0.014*** (0.004)				
<i>Impbefore</i> × <i>Foreign</i>	-0.006** (0.003)				
<i>Impbefore</i> × <i>East</i>		-0.025*** (0.004)			
<i>Impbefore</i> × <i>Small</i>			0.013*** (0.002)		
<i>Impbefore</i> × <i>High</i>				0.008 (0.008)	
<i>Impbefore</i> × <i>Upper middle</i>				0.004 (0.008)	
<i>Impbefore</i> × <i>Lower middle</i>				0.010 (0.008)	
<i>Impbefore</i> × <i>Developed</i>					0.001 (0.002)
<i>Small</i>			0.029*** (0.001)		
<i>High</i>				-0.059*** (0.002)	
<i>Upper middle</i>				-0.046*** (0.002)	
<i>Lower middle</i>				-0.024*** (0.001)	
<i>Developed</i>					-0.011*** (0.001)
常数项	0.561*** (0.000)	0.561*** (0.000)	0.543*** (0.001)	0.607*** (0.001)	0.567*** (0.001)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目的地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	12 673 265	12 673 265	13 286 720	12 668 458	12 673 286
调整后的 R ²	0.298	0.298	0.214	0.294	0.294

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金流相对充裕,出口行为受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小,因而出口沉没成本降低对其出口行为可能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相比之下,当出口沉没成本降低时,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受融资约束的限制可能得到较大缓解,将更愿意进行试错,因而民营企业的出口试错效应更大。另一方面,大部分外资企业的进口供应商和出口客户可能都属于同一母公司下的关联企业,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因而比民营企业的出口状态更加稳定,不会轻易改变和退出既定的出口市场。

2. 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为检验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影响是否随企业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企业分为东部地区企业($East=1$)与中西部地区企业($East=0$),并将变量 $East$ 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根据表 10 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进口市场经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更大。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具有更强的集聚特征(苏丹妮等,2018),外国市场知识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因而进口市场经历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会产生更强的降低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基础、开放程度、交通设施等各方面原因,东部地区企业拥有较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和较为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否具有进口市场经历,都愿意积极进行出口尝试。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本身可能更加保守,不愿意轻易试错,但当进口市场经历降低了出口沉没成本时,可能会增加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出口尝试的意愿,试错的概率也将提高,因而进口市场经历通过沉没成本降低机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具有更强的提高效应。

3. 企业出口规模异质性。为检验进口市场经历对不同出口规模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影响,本文将出口总规模位于中位数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小型出口企业($Small=1$),其余企业定义为大型出口企业($Small=0$),在回归中加入 $Small$ 及其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表 10 第(3)列汇报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相较于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进口市场经历更会提高出口规模较小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概率。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第一,小规模出口企业对市场的变化可能比大规模出口企业更敏感,对市场状况调整更灵活,进口市场经历带来的逆向出口滞后效应也就更强(Love and Ganotakis, 2013)。第二,相较于大规模出口企业,小规模出口企业更有可能是机会主义者,更愿意进行出口试错(Bermini *et al.*, 2016)。小规模出口企业受到的

融资约束可能更多,沉没成本降低可以减小融资约束对它们出口参与的制约,促使其进行试错。因此,进口市场经历对小规模出口企业带来的试错效应也更强。

4. 出口目的地异质性。为检验进口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影响是否随出口目的地的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将各国划分为高收入国家(*High*)、上中等收入国家(*Upper middle*)、下中等收入国家(*Lower middle*)以及低收入国家(*Low*)4类,并以低收入国家(*Low*)为对照组,在回归中分别加入反映收入水平的虚拟变量 *High*、*Upper middle*、*Lower middle* 以及各自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 10 第(4)列。从中可知,3 个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并不因市场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存在差异。此外,本文还将高收入国家界定为发达国家(*Developed*),将其余 3 种收入类别的国家界定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在回归中加入 *Developed* 及其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 10 第(5)列。可以看到,交互项系数仍然不显著,再次验证了进口市场经历对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具有普遍性,不随国家收入水平而变化。

五 拓展性分析

(一)进口市场经历的动态效应

本文进一步考察进口市场经历对出口市场退出的动态效应。为此,我们将企业的出口退出行为进行细分,构建了变量 *Exit_Nyears* ($N=2, 4, 6, 8, 10$),表示企业在进入该出口市场 N 年内是否退出出口市场,若是,则变量 *Exit_Nyears*=1,否则为 0。具体回归结果参见表 11,从中可知,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具体来看,进口市场经历最有可能导致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 2 年内退出出口市场,然后是导致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 4 年内退出出口市场,并随着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间的增长而逐步递减。

这一结果表明,进口市场经历更容易促使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初期退出出口市场。这可能是因为:(1)沉没成本降低机制的试错效应主要发生在出口初期,尤其是出口后的前 2 期(Cadot *et al.*, 2013),一旦尝试失败,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很大,因此沉没成本降低机制对出口市场退出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出口初期,之后逐渐减小。(2)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初期,抗风险能力有限,沉没成本降低机制的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和进出口市场重叠机制带来的风险叠加效应可能更大。随着企业逐渐在外国市场站稳脚跟,企业的试错效应、逆向出口滞后效应以及风险叠加效应都逐渐减弱,因

而进口市场经历对出口市场退出概率具有提高效应的机制都在逐渐弱化。(3)具有降低效应的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才能逐渐产生作用,因此,在出口中期,信息壁垒降低机制才开始占主导地位,使进口市场经历对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综合影响变为显著的降低效应。然而,随着出口经验的不断增加,企业通过出口参与也在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取代了进口市场经历的作用,因而出口前的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已经不再具有显著影响,产生了时间衰减效应。

以上结果表明,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主要发生在企业向特定市场出口的初期,即进口市场经历主要能解释企业向特定市场出口初期的退出行为。而已有文献普遍发现,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后前2年的退出概率最高,之后逐步降低,即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主要发生在进入出口市场的初期(Kasahara and Tang, 2019),这正好与本文结论相契合,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从进口市场经历的角度解释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使本文理论分析更具说服力。

表 11 进口市场经历的动态效应

	(1)	(2)	(3)	(4)	(5)
	<i>Exit_2years</i>	<i>Exit_4years</i>	<i>Exit_6years</i>	<i>Exit_8years</i>	<i>Exit_10years</i>
<i>Impbefore</i>	0.052*** (0.001)	0.030*** (0.001)	0.017*** (0.001)	0.009*** (0.001)	0.002*** (0.001)
常数项	0.699*** (0.000)	0.851*** (0.000)	0.926*** (0.000)	0.967*** (0.000)	0.990*** (0.000)
观测值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6297 574
调整后的 R ²	0.267	0.246	0.200	0.144	0.087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和目的地固定效应。

(二)进口市场经历与其他相似市场出口经历的交互影响

企业在向某一特定市场出口前,不仅可能具有该市场的进口经历,还可能具有其他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理论上,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也会通过出口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和沉没成本降低机制影响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①。那么,这两种经历对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出口退出是否存在交互影响?对此,本文参照 Morales(2019)的研究,考察如果出口到特定市场前,企业具有与该国在地理位置、官方语言或收入水平属于同一类别

① 与进口市场经历不同,相似出口市场不会通过进出口市场重叠渠道影响企业出口。

的出口市场经验,那么分别反映这3种出口经历的虚拟变量 *Geobefore*、*Lanbefore*、*Incbefore* 等于1,否则为0。本文在回归中纳入这3个出口经历变量及各自与 *Impbefore* 的交互项,表12汇报了具体回归结果。

从表12可以看到,3种相似市场出口经历变量与 *Impbefore* 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其他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尤其是收入水平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能显著降低特定市场进口经历对企业在该特定市场出口退出的提高效应。这可能是因为,特定市场的进口市场经历与其他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能够为企业了解该特定市场提供不同方面的信息,具有互补性,对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的信息壁垒降低机制得到强化。

表12 进口市场经历与相似市场出口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交互影响

	(1)	(2)
	<i>Exit</i>	
<i>Impbefore</i>	0.078*** (0.001)	0.099*** (0.002)
<i>Impbefore</i> × <i>Geobefore</i>		-0.007* (0.004)
<i>Impbefore</i> × <i>Lanbefore</i>		-0.007** (0.003)
<i>Impbefore</i> × <i>Incbefore</i>		-0.030*** (0.004)
<i>Geobefore</i>	0.027*** (0.002)	0.026*** (0.003)
<i>Lanbefore</i>	0.029*** (0.001)	0.022*** (0.002)
<i>Incbefore</i>	0.044*** (0.002)	0.063*** (0.003)
常数项	0.463*** (0.001)	0.453*** (0.001)
观测值	12 673 265	12 673 265
调整后的R ²	0.299	0.299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年份和目的地-年份固定效应。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出口市场的稳定和拓展对推动外贸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帮助出口企业“保市场”和“拓市场”是国家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6年的海关数据,考察了企业从特定市场进口的经历对其从该市场出口退出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特定市场进口的经历会显著提高企业在该特定市场的出口退出概率。其具体机制为:进口市场经历通过信息壁垒降低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从该特定市场出口退出的概率(降低效应);通过沉没成本降低机制,引致逆向出口滞后效应和出口

试错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从该特定市场出口退出的概率(提高效应);通过进出口市场同期重叠机制,引致汇率风险的对冲效应和非汇率风险的叠加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从该特定市场出口退出的概率(降低效应),其中沉没成本机制的提高效应在3种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第二,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提高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小型出口企业中影响更大。但是,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并不因该市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第三,从动态效应看,进口市场经历最有可能导致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2年内退出出口市场,并随着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间的增长而逐步递减。第四,当企业具有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尤其是具有与特定市场收入水平相似市场的出口经历时,能显著减小特定市场进口经历对企业在该特定市场出口退出概率的提高效应。

本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启示意义。已有文献在讨论出口市场优化布局问题时,通常仅局限于出口市场本身,而本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进口经历会对其出口市场调整产生影响。因此,国家和企业在调整出口市场时,有必要考虑进口市场的影响。

首先,一般认为,与没有进口行为的企业相比,有进口经历的企业更容易开拓出口市场,特别是在开拓特定出口市场时,若企业在以往曾在该市场从事过进口贸易,那这一进口经历会更有利于企业对该特定市场的出口。但本文结论与一般认知不同,即企业从特定市场的进口经历整体上会显著提高企业从该特定出口市场退出的概率。因此,国家和企业在调整出口市场、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时,应充分考虑进口市场和进口经历,辩证地看待进口经历对出口市场变化的影响,趋利避害。

其次,出口沉没成本降低是一把双刃剑,企业进口经历引致的出口沉没成本降低是导致企业退出该特定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长期以来考察企业出口市场不稳定、退出出口市场被忽视的“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行为,不能一味地认为出口市场退出就是不好的,企业在单个市场的出口退出可能是企业积极进行出口尝试、灵活调整出口市场布局、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的理性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小型出口企业的进口市场经历对企业出口市场退出的影响较大,国家要高度重视这些企业的出口风险。

最后,在国家实施积极扩大进口的背景下,从事进口贸易的中国企业将可能逐渐增多,但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企业转换出口市场和开拓新出口市场可能变得日益频繁,国家政府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考虑将具有进口经历的市场作为新出口目标市场,充分利用和挖掘进口市场经历,并结合企业在其他相似市场上的出口经历,尽可能降低企业在具有进口经历市场上

的出口信息壁垒,从而降低企业从新出口市场退出的概率。另外,国家政府应帮助企业在开拓新出口市场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并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避免频繁的出口市场退出,保持出口市场稳定。

参考文献:

- 蒋灵多,陆毅,陈勇兵(2018):《城市毗邻效应与出口比较优势》,《金融研究》第9期。
- 盛丹,刘竹青(2017):《汇率变动、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世界经济》第1期。
-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2018):《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 铁瑛,刘逸群(2021):《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铁瑛,张明志,陈榕景(2019):《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5期。
- 王永进,孟珊珊(2022):《企业内生进口网络、沉没成本与出口市场选择——基于“矩不等式”估计方法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
- 魏浩,连慧君,王超男(2022):《中国纯进口企业之谜:进口的作用》,《统计研究》第5期。
- 魏浩,涂悦(2023):《外部需求变化与中国企业出口市场调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 魏浩,王超男(2023):《外国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组合调整与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魏浩,张文倩(2022):《进口关税调整、传递效应与中国企业进口价格》,《经济学(季刊)》第3期。
- 魏浩,张宇鹏(2020):《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第6期。
- 吴群锋,杨汝岱(2019):《网络与贸易:一个扩展引力模型研究框架》,《经济研究》第2期。
- 许家云,毛其淋,胡鞍钢(2017):《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世界经济》第3期。
- 张国峰,王永进,李坤望(2016):《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基于社交与沟通外溢效应的考察》,《世界经济》第2期。
- 张杰,郑文平,陈志远,王雨剑(2014):《进口是否引致了出口:中国出口奇迹的微观解读》,《世界经济》第6期。
- 赵永亮,刘猛(2020):《出口企业存在跟随学习效应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
-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5, pp. 1369–1401.
- Ahir, H.; Bloom, N. and Furceri, D. “The World Uncertainty Index.”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9763, 2022.
- Ahn, J.; Khandelwal, A. K. and Wei, S-J.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Facilitating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 pp. 73–85.
- Albornoz, F.; Calvo Pardo, H. F.; Corcos, G. and Ornelas, E. “Sequential Export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8(1), pp. 17–31.
- Albornoz, F.; Fanelli, S. and Hallak, J. C. “Survival in Export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2, pp. 262–281.

- Amiti, M.; Itskhoki, O. and Konings, J. “Importers, Exporters, and Exchange Rate Disconnec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7), pp. 1942–1978.
- Angrist, J.D. and Pischke, J.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1–53.
- Artopoulos, A.; Friel, D. and Hallak, J. C. “Export Emergence of Differentiated Good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ort Pioneer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in Argent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5, pp. 19–35.
- Baker, S. R.; Bloom, N. and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pp. 1593–1636.
- Bas, M. “Inter-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Expor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pp. 481–493.
- Berman, N.; Vincent, R. and Vincent, V. “Demand Learning and Firm Dynamics: Evidence from Exporte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9, 1, pp. 91–106.
- Bernard, A. B.; Jensen, J. B.; Redding, S. J. and Schott, P. K.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3, pp. 105–130.
- Bernini, M.; Du, J. and Love, J. H. “Explaining Intermittent Exporting: Exit and Conditional Re-Entry in Export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6, 47(9), pp. 1058–1151.
- Besedeš, T. and Prusa, T. J. “The Role of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and Export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2), pp. 371–379.
- Blum, B. S.; Claro, S. and Horstmann, I. J. “Occasional and Perennial Expor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90(1), pp. 65–74.
- Cadot, O.; Iacovone, L.; Pierola, M. D. and Rauch, F. “Success and Failure of African Export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pp. 284–296.
- Choquette, E. “Import-Based Market Experience and Firms’ Exit from Export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3), pp. 423–449.
- Defever, F.; Heid, B. and Larch, M. “Spatial Expor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5(1), 2015, pp. 145–156.
- Eaton, J.; Eslava, M.; Kugler, M. and Tybout, J. “Export Dynamics in Colombia: Firm-Level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s*, No.13531, 2007.
- Eaton, J.; Kortum, S. and Kramarz, F.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 *Econometrica*, 2011, 29(5), pp. 1453–1498.
- Erbahar, A. “Market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Importers.” *World Economy*, 2019, 42(4), pp. 1110–1151.
- Eriksson, K.; Johanson, J.; Majkgård, A. and Sharma, D. D. “Experimental Knowledge and Cost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7, 28(2), pp. 337–360.
- Esteve-Pérez, S. “Previous Experience, Experimentation and Export Survival: Evidence from Firm-Product-Destination Level Data.” *World Economy*, 2021, 44(9), pp. 2638–2682.

- Feng, L.; Li, Z. and Swenson, D. L.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1, pp. 86–101.
- Fitzgerald, D. and Haller, S. "Exporters and Shoc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3, pp. 154–171.
- Geishecker, I.; Schröder, P. J. H. and Sørensen, A. "One-off Export Event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52(1), pp. 93–131.
- Gullstrand, J. and Persson, M. "How to Combine High Sunk Costs of Exporting and Low Export Survival."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1), pp. 23–51.
- Hu, C. and Tan, Y. "Learning to Import from Neighbo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1, 101455.
- Iacovone, L.; Rauch, F. and Winters, L. A. "Trade as an Engin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Mexican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89(2), pp. 379–392.
- Kasahara, H. and Lapham, B. "Productivity and the Decision to Import and Export: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89(2), pp. 297–316.
- Kasahara, H. and Tang, H. "Excessive Entry and Exit in Export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25878, 2019.
- Kneller, R. and Pisu, M. "Barriers to Exporting: What are They and Who Do They Matter To?" *World Economy*, 2011, 34(6), pp. 893–930.
- Lawless, M.; Siedschlag, I. and Studnicka, Z. "Firm Strategies in Expanding and Diversifying Exports." *World Economy*, 2019, 42(2), pp. 349–375.
- Lee, W.; Mulabdic, A. and Ruta, M. "Third-Country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 Fir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3, 140, 103688.
- Love, J. H. and Ganotakis, P. "Learning by Exporting: Lessons from High-Technology SM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3, 22(1), pp. 1–17.
- Mayer, T.; Melitz, M. J. and Ottaviano, G. I. P.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1, 103(5), pp. 874–891.
- Meinen, P. "Sunk Costs of Exporting and the Role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48(1), pp. 335–367.
- Morales, E.; Gloria, S. and Zahler, A. "Extended Gra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9, 86(6), pp. 2668–2712.
- Nguyen, D. X. "Demand Uncertainty: Exporting Delays and Exporting Fail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 pp. 336–344.
- Paravisini, D.; Rappoport, V.; Schnabl, P. and Wolfenzon, D. "Dissecting the Effect of Credit Supply on Trade: Evidence from Matched Credit-Export Da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1), pp. 333–359.
- Pinho, J. C. and Martins, L. "Exporting Barriers: Insights from Portugu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xporters and Non-Expor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0, 8(3), pp. 254–272.
- Rauch, J. E. "Networks Versus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 pp. 7–35.

Roberts, M. J. and Tybout, J. R. "The Decision to Export in Colombia: An Empirical Model of Entry with Sunk Cos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4), pp. 545–564.

Stirbat, L.; Richard, R. and Konesawang, N. "Th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Determinants of Export Survival in Lao PDR."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6, pp. 82–94.

The Puzzle of the Excessive Export Market Exit of Firms with Specific Import Market Experience

Wei Hao; Tu Yue

Abstract: Excessive export market exit remains an unsolved puzzle. It is now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ntributes to the survival of exports and mitigates export market exit.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effect that a firm's market-specific import experience has on export market exit. Using Chinese customs data from between 2000 and 2016, on the one hand, the paper empirically finds that import experience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an exporter's exit from the export market, which at first glance appears to be counterintuitive; on the other hand, it verifie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trasting but not mutually exclusive mechanisms. (i) The market learning mechanism creates a diminishing impact; (ii) the sunk cost reduction mechanism creates an increasing impact through both the reverse hysteresis and trial-and-error effects; and (iii) the import-export market overlapping mechanism—a newly identified mechanism in the paper—has a decreasing impact through the risk hedging effect, and an increasing impact through the risk amplifying effect, with the former dominating. Further, it uncovers some heterogeneous and synergic effects of the import experience. The study findings revitali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 experience and export market exit,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to exporters on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import experiences to promote exports and diversify risk.

Key words: import market experience, export market exit, information barriers, sunk cost, import-export market overlapping

JEL codes: F10, F14

(截稿:2023年12月 责任编辑:王 徽)